

• 理论研究 •

《黄帝内经》理论与文本体例源流解析*

石翎笙 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黄帝内经》是中国早期较成系统的医学典籍。通过探索上古文献普遍传承规律,本文对《黄帝内经》一书理论与文本体例两层次的源流展开梳理。《黄帝内经》理论内容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周官医学时期,几经世代口耳相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以书面文本为主体的文献形式。成文初期文本以简牍为载体,因而多呈以零碎篇章为单位的片段化流传;后随汉人将篇章不断联系成较长的篇幅,逐渐形成医书式的汇编;并于唐代王冰以义理梳理贯通后文本最终定型,流传至今。
关键词: 黄帝内经; 上古文献; 简牍; 王冰

中图分类号: R221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8.06.001

Analyzing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ories and text styles of *Huangdi-Neijing**

Shi Lingsheng, He Juan[#]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Huangdi Neijing*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is a medical classic in its own system in early ancient China. Through exploring the shared rules of ancient literatures inheritan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ories and text styles of *Huangdi Neijing*. The theories of *Huangdi Neijing* derived from the medical experience of senior official doctor in Zhou Dynasty. In a long course of history, *Huangdi Neijing* was handed down between generations from ear to ear, mouth to mouth, until the particular written history set in.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text was written on the bamboo slips and was distributed chapter by chapter. In Han Dynasty, these scatted chapters were collected and compiled into a medical book. In Tang Dynasty, Wang Bing, a TCM practitioner, reorganized the chapters and finalized the version, which is still available in modern days.

Keywords: *Huangdi Neijing*; ancient literature; bamboo slips; Wang Bing

《黄帝内经》是中国早期医学体系的代表著作。目前公认的结论为:其文本形成可上溯至战国时期,经后世历代修订,西汉公元前26年《七略》的“黄帝内经十八卷”是对于书名和体例的最早记载,成为文献体例稳定的一个标志。

张灿璵提出“取材于先秦、成编于西汉、补亡于东汉、增补于魏晋南北朝、补遗于唐宋”的《黄帝内经》文献整体流变过程^[1]。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西

汉《黄帝内经》整理定名之时为界点,分为“未成文前往上起源于先秦”的医学理论与“已成文后往下流传于汉唐”的医学资料文本两个阶段,分别对《黄帝内经》一书的医学理论内容来源与医学文本体例变迁进行解析。

医学知识的流传不会脱离整体大环境的历史背景,其内容的文献流传形式亦不会独异于先秦文献“自周以前起的源流形式”的大体规律。同时,纵观

石翎笙,女,在读硕士生

[#] 通信作者:贺娟,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五运六气学说, E-mail: hejuan6428@sina.com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8157409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 81574098)

在先周以前的文献流传史,经典文献(如殷商甲骨文书、周官时代文本、儒家文献)明显比医学文献拥有更丰富的材料。因此方法上,本文将通过对举同时期“材料更丰富、结论更成熟”的非医学文献流传特点,反推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内容自先周流传至两汉时期成书的过程。

1 《黄帝内经》秦以前理论源头及流传模式

《黄帝内经》无论在内容形成还是编次成书皆非一人一时一地的产物。马继兴提出,虽历代在文本上有所修改,然其内容上涉及了自有文字以来殷商、西周春秋等时期大量简帛医籍佚文^{[2]68}。这种文献的累积与变动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方趋于稳定,内容上则包含了丰富的先秦理论知识。

1.1 先周时期医学理论口耳相传,同一内容多种文本互见而不完全一致

先周时期信息传递大多没有文字作为载体。在文字形成、成熟并广为流传之前,人类随经验的积累已经开始逐渐总结出各种成体系的理论。即某些后世文本的“内容”在此阶段已经形成,只是还没有被以固定的文本形式记录下来。以《周易》所承载的理论内容到成书的过程为例,据《说文解字·序》所载,先有“古者庖牺氏观物取象作易八卦”,后才有“黄帝史官仓颉见鸟迹初造书契”。其“文本”经历了伏羲氏画八卦、文王演八卦、孔子作易传三个层次的累加后才稳定下来,可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周祖谟^{[3]175}提出“周、秦、西汉之书,其先多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的观点。口耳相传文献载体模式,导致了先周文献“内容产生远远早于文本定型”的现象。除少量政治记录外,先周时期各种学科的理论内容没有固定的文本。例如对比《尚书·尧典》与《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先周传说“推举鲧治水”文段。《尧典》中“帝曰‘咨!四岳……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金曰‘于!鲧哉。’”《夏本纪》曰“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皆曰鲧可。”两者所载为同一事件,即拥有同样的“内容”。由《尚书》可知传说内容的发生形成最晚不会在春秋之后。而司马迁使用西汉当下通行的语言作《史记》,即将此传说的文本定型时间推至了西汉。先周文献内容与书面文本存在不同现象,其特征是同一内容往往会有多种文本形式并存。

《黄帝内经》文本中亦留有此阶段的遗存特点。《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有“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

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的记载。而与本段所蕴含思想同源的文献可上溯到《春秋左传》。最早的医学文献材料《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载“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两厢理论内容上而言同出一辙,而文本层面各有时代特征。相较之下,《黄帝内经》的六气五味理论文字描述更为具体。《春秋左传》保留了大量春秋时期上层社会的历史材料,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开始变动,在旧秩序崩塌之前,学术各方面皆上承自周朝官学体系,医学亦无例外。因此《左传》对医学理论的论述可视为对周官医学理论的留存,从而推知《黄帝内经》这段理论内容最早可以追溯至周官医学时期。

1.2 先秦时期医学理论承自周官医学,文本内容分散且多冠以托古

医学理论经长期“口耳相传”为主体的信息传承,至周代慢慢形成有少量文字著述的官学。据《周礼》载,医属“天官”列,分为四科,可见医学理论最晚在周代已初步形成体系。《左传》中所记载“秦医缓和”事迹,都是在为王官之人服务的过程中零星留下了对当时医学理论的阐述。这些古老的医学材料尚可窥见当时理论与治法的完备^[4]。《黄帝内经》中多次提到《黄帝内经》以前的上古经书,古之言“经”,指在某一领域被奉为典范的著作。在上古之时,有典范地位的文献,即特指周官时期具有较为稳定文本的经典文献。

周代官师合一,沿袭自上古的学问至周代皆掌握在官方手里,医学理论内容是其中之一。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中指出“古无文字,结绳之治……圣人为之立官分守……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5]。周官之学有两大特点,其一,它是学科绝对的准绳,天下仅此一家之说;其二,唯上层社会方能接触,民间不仅不会自成一派也无法接受官学系统下的学习。这种官守其学的制度,使得周官医学的理论内容和文本在高度统一的基础上没有广泛流传。

春秋战国之后,周天子地位被动摇,“王道既微,诸侯力政”^[6]。王官之学流入民间,私学兴起,各种官学分散自成流派,周朝遗留的学科准绳性的医学体系也随社会动荡而迅速解构分散,并慢慢发

展为多个医学流派。现存《黄帝内经》162篇之间,仍可见到各家流派对脏腑理论、脉法、阴阳划分属截然不同的医学理论观点,可视为这一阶段在《黄帝内经》中的遗存。另外,当时崇尚复古,各家学派只求自己奉行的正学达道能彰显于天下,不求自己的虚名显耀于世,纷纷以承袭黄帝之学自居,加之学术争鸣需要将自我主张迅速广泛流传开来,因而“著书成文”的风气、“托古作伪”的现象便应运而生。《黄帝内经》一名可谓是这种现象孕化而生的典型。其所成之书虽非黄帝本人亲手所作,但从内容的源流来看,也不能否认有对周以前乃至黄帝时期理论的传承。

在《黄帝内经》编次成书文本定型前,其内容产生具体过程虽没有像周代官学文献那样有足够多的证据考证,然而流传至今的王冰本《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中有对“近世”“上古”“中古”即周及以前医学模式的描述^{[2]60}。《素问·异法方宜论篇》中五方医学的起源与早期医学材料《左传·成公十年》中提及的“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多种疗法方式相呼应。在各地考古挖掘中亦有相应砭石等器具陆续发现。这些都是对《黄帝内经》中先周时代理论内容的印证。《素问·著至教论篇》中亦有“上通神农,著至教拟于二皇”如此以黄帝立场而慨发的言语。针对这些现象,承载“内容”的“文字”虽不古朴若《尚书》的商周文风,但在这样的文本源流环境下,其真实可靠程度有一定合理性,不能皆一并妄作汉时“托古”之风判断,而应当有一定的辨析与识别。

后至秦朝焚书坑儒,各家经籍消亡程度进一步加重,周官学术遗风更加离散。至汉代,为整顿经秦火劫余学术理论及文本的混乱局面,官方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校书活动——由刘向、刘歆主持编次《七略》。曹之将《七略》的编撰过程概括为九步^[7]——“网罗众本、审定篇第、校勘文字、确定书名、撰写叙录、缮写定本、分作六类、撰写类序、编成目录”。医学理论在这一历史环境下进行了一场大型的重新整合,社会上分散的医学理论流派至此被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门类36家。汉初文景之治大兴黄老之学,受此思想熏染,各地零散片段化的医学简帛(代表文献:马王堆出土医书)篇章经校勘编次,被冠以“黄帝”之名,最终合编成《黄帝内经》18卷。《黄帝内经》之“书名”与“文本体例”就此被确定下来,同时与《黄帝外经》等其他6本书列

于“医经”之下。这也标志着《黄帝内经》理论内容正式进入了文本较为稳定、以简帛为载体的合编式成书阶段。

2 《黄帝内经》汉以后文本的流变过程

通过分析《黄帝内经》的理论源流背景,《黄帝内经》的文本体例主要可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篇章式零散文本、合编式成书、经义理梳理的系统汇编。文献载体形式对文本体例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首先要辨析《黄帝内经》成文早期文献载体的特点。《灵枢·病传》言“可著于竹、帛。”《灵枢·禁服》言“近者编绝,远者简垢。”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世纸书通行^[8]以前,西汉盛行的文本载体是简牍^[9]。自周官医学流散民间私学兴起到西汉编次《七略》整合医学资料的近一千年间,若不谈《内经》中由于机要珍贵而“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的个别文献,“简牍”是《内经》内容从语音信息转化成以文字信息为主体时的第一种载体形式。

2.1 西汉成文早期以“篇章”为单位的零散流传

载体与文本的体例有密切的关系。一支竹简可以书写几十字,由于受到面积限制,只能在一定字数范围内论述以一个问题为中心的内容^{[2]61}。这种载体使得文献在医理阐述的撰写初期阶段具有条文单篇化的特点。

这种单篇条文化的医学资料往往只载录医理内容而不标记标题和作者。余嘉锡《古书通例》中提出秦汉文献“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多无大题”“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古书多造作故事”“古书单篇独行”“古书不皆手著”六大特点。前两个特点在各地出土的医书文献的汉简中尤其明显。例如西汉初马王堆出土的两篇《十一脉灸经》医书,书本无名,其名为后世研究者为方便标引而根据其内容特点命名^[10]。《十一脉灸经》内容上与《灵枢》中的《经脉》篇一脉相承,然而却以单篇独立存在,并在张家山汉墓简书中拥有第三种单篇篇幅的传本。可见在《黄帝内经》成书前有各个篇章各自独立存在的现象。

余嘉锡提出刘向整理群书之前的古书多“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3]222}。即“西汉以前无文集,古书多单篇单行”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期“刘向始合中外之本定著为若干篇”^{[3]283}才有所变化。同为刘向所整理的《黄帝内经》中诸篇,在成书前情况自然也与之相符——呈现以篇章片段化独立流传的面貌。即便在成书之后,文集的编次也有一种对零散篇章“聚而编次之”的随意性^[10],如保留更多早期特征的《灵枢》比起

王冰整理后的《素问》,在篇章次序上显得更零散。而经林亿校注复原后、代表《素问》早期面貌的全元起本《素问训解》,各篇章间的次序亦没有特别明确的意义。

彼时文献亦有“单篇别行”等现象,经学中《礼记》诸篇在收入《礼记》之前均以“结构完整、主题独立”的单篇条文流传,在合篇成书以后零散的篇章亦与合编本共存^[11]。《黄帝内经》部分篇章在成书后亦是如此。例如《伤寒论·序》中将《阴阳大论》作为独立一书与《素问》并称。《阴阳大论》的内容已被编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只是原来单行之篇亦并行于世,这便属于“单篇别行”中“原篇别行和书并存”的现象。

综上皆可说明成文早期的文献往往以“篇”为单位流传,且没有固定的篇名、书名,存在的较为散逸、不成系统。而后,随着后世对各家文献的整理风潮,医学文献也进入下一个单篇合编的阶段。

2.2 对《黄帝内经》零散篇章以“对话体文本”相互连接的初步整理

《黄帝内经》将单篇别行条文串联起来的一种主要方法是用“对话体”的框架进行连接。这种体例最早见于经学儒家经典,如《礼记》中某些篇章。《礼记》和《黄帝内经》的成书过程最为类似,《礼记》也是一本比较典型的成书于较长一段时间、非一人一时一地对礼学理论条目整理的著作。在《礼记》零碎的文本中能发现很多与《黄帝内经》体例的相似点。以《礼记·哀公问》为例,现存传世的《礼记·哀公问》包括“问礼”和“问政”两部分大段论述理论的内容,文本形式采用“哀公问于孔子曰”对话体文献,与《黄帝内经》“黄帝问于岐伯曰”相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话体文本往往并不旨在记录真实的问答对话场景。哀公问孔子的真实事件见于传世史书《左传·哀公十四年》与经书《论语·宪问》,其中哀公与孔子的对话都是就确切的事件做出相应切实的回答,问答内容皆有明确的时间点和具体的指向。以前者为例,《左传·哀公十四年》载“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可见在历史记载中真实发生的对话里,孔子的回答是针对具体事件而言之,并没有涉及如《礼记》所记载“礼”与“政”大篇幅的理论内容。而《礼记·哀公问》所载之对话体文本,并非以记录真实“孔子与哀公对话”历史事件为目的,而是

有意借用“哀公问于孔子”这一场景,以形式上的完整来保证大段理论文本的阐述。这种以“哀公问”套问文体为形式阐述的理论杂见于各种类型篇章,如《孔子家语》《大戴礼记》《礼记》,每次论述的内容皆互不相同。借用这样“对话体”的框架使得原本“篇章式流传”的理论,在这一问一答中文本逻辑与主题变得清晰起来。

“对话体”文本在医学理论内容的表述中有众多例子,例如同样阐释诊法“神圣工巧”境界的内容,《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以“黄帝问于岐伯”为套问格式,《难经·六十一难》则未使用对话体直接对医学内容进行引用,晋代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中则以“黄父问于岐伯”为套问格式,明代兽医专书《元亨疗马集》中以“东溪问于曲川”为套问格式。

这种因“对话体”而文意通顺的现象在《黄帝内经》中数不胜数。以《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为例,传世本《黄帝内经》全书第一问是以(黄帝)乃问于天师曰引出下文解释“为何上古人年皆度百岁动作不衰,而今人半百而衰”的主题。第二问则就“人年老而无子”现象进行原因探讨。这两部分所阐述的理论原各自可独立成篇,然而这两部分结合为一文时,若没有“黄帝问”作为衔接,逻辑上就显得非常分散了。通过“黄帝问于岐伯曰”点出前后理论的主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古人遂能将多个独立的理论篇章连接形成一个以“论上古天真”为主题的整体。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文本流传形式,倾向于将篇章式零碎的条文用一定的套问格式予以联系和连接,即是从篇章式零散文本到合编式成书的过渡。在儒家是借“孔子与哀公对话”的情境阐释自己的理论,而医学各学派学术观点则套问于“黄帝与某臣”的形式之下整理编纂成文流传。

早期文献为篇章式片段的流传,以“章”为单位,文献篇幅短小,阐述内容独立分散。而后在对文献不断的整理中,例如以对话文体连接,章连成篇,篇串成卷,而形成较长篇幅的文献流传单位。至西汉中期,刘向搜罗天下之书进行整理,将经初步整理仍较分散的篇章编次为医书文献。其中比较可靠的篇章被编入“内”经之中,首次确定了“黄帝内经”的书名^[10]与18卷的体例。

2.3 后世魏晋隋唐以“文意义理”对次序的重新编排

在经学界,后世的汉学渐渐开始注重对义理的

阐释,尤其重视文意的逻辑通顺、结构合理。因此在篇章“次序”上以自己的治学思路做出调整,对文本进行了重新的规划。早期文本经世代学者修改,变得越来越有条理性。以《礼记·缙衣》为例,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通过今本、郭店本、上博本之间的对读,提出了文本“板块移动”现象的理论。即言对比多种文本之间的差异,发现不同文本中同一主题条文之间相对位置往往不变,犹如一板块,只是以此板块为单位不同文本在次序上存在差异。并且进一步分析这种次序上差异的意义时,李零认为传世文本比出土文本在文理上更为通顺^[12]。与出土文本相比,传世文本经历过历代学者的修订。因此传世本相较于出土文本拥有更连贯的逻辑阐述,这意味着历代学者有意在整理文献时梳理条文上下的“文意义理”关系。这大致可以体现儒家经典文本自战国到汉初歧变的一般规律^[13]。

在这一学术风气背景下,《黄帝内经》成书后的经典化也经历了对文本次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动,以适应某种正统意识形态的逻辑标准的过程。《黄帝内经》现存流传至后世可供研究的传本主要有《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其中魏晋时期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一书,是对《素问》和《针经》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编纂而成的一部针灸学奠基之作,这是魏晋时医家以一定的医学逻辑对《黄帝内经》一书中诸多条文理论板块进行“板块移动”的代表著作。唐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也以一定的医理对《素问》和《九卷》全文进行重新分类合编。然而,以文意义理重新编排阶段中最典型的例子首推后世唐代王冰整理《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后称王冰本《素问》)。

王冰本《素问》主要是对当时的传世本《素问》篇章条文之间义理层面的梳理和修订。王冰本《素问》序中言“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并提出重新编次修订《素问》世本的原则:其一,连贯重接文段“简脱文断,义不相接”,则“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其二,加字通顺医理“篇目坠缺,指事不明”,则“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其三,分篇“篇目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则“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其四,删繁“错简碎文,前后重迭”,则“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14]。足以见得其对《素问》世本的整理原则。

当时《素问》世本^[15]中最具代表的是现已亡佚的《素问训解》(又称全元起本《素问》)。此书虽现已亡佚,但林亿在整理王冰本《素问》时对全元起本

《素问》的篇次信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并提出“王氏重次篇第,移冠篇首”。通过与复原后全元起本次序对比可见,经王冰整理的通行本系统性变强、内容相对集中。王冰本《素问》第1、2卷(第1~7篇)主要以阐释摄生、阴阳五行学说为主,第3卷(第8~11篇)集中论述藏象理论,第4卷(第12~16篇)阐释治法理论,第5、6卷(第17~20篇)主要载录诊法理论,第7卷(第21~24篇)主要论述病机思想,第8卷(第25~30篇)主要谈论针道与相关病机理论,第9~13卷(第31~49篇)主要论述各种疾病的病机以及诊治方法,第14~18卷(第50~65篇)主要论述腧穴和针道理论,第19~22卷(第66~74篇)主要论述运气学说,第23、24卷(第75~81篇)主要谈论病机治则和医德等思想^[16]。编书的医家不一定参与了内容的撰写,但也能通过编排篇目的次序目录展现出自己的治学思路与逻辑。王冰本《素问》体现了王冰对医理的展开与联系,在《黄帝内经》构建的医学理论体系中注入了唐代医学学术框架。通过对《素问》世本从分篇、改序、迁段到个别文字细节上的改动,千年来王冰本《素问》已成为现存《素问》版本中最通行的版本,影响深远。

王冰本《素问》是医家以文意对传世本《素问》片段化的文本次序重新编排的典型产物。因此,《黄帝内经》经后世医家“板块移动”式的整理,各篇章之间内容相关的条文被整理至一处以共同阐述一个主题,《黄帝内经素问》文本的医学结构层次更加清晰。至此,《黄帝内经》的文本体例基本稳定。

3 结语

本研究是为了梳理《黄帝内经》内容来源与文本流变过程而展开的一次探索。根据上古文献传承规律解析,《黄帝内经》的内容有较早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周官医学时期。几经世代口耳相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以书面为主体的文献形式。由于以简牍为载体,成文初期文本多呈以零碎篇章为单位的片段化流传。后随汉人将篇章不断联系成较长的篇幅,逐渐形成医书式的汇编。《黄帝内经》成书后,后世医家继续对其文本进行文意层面的调整,乃至唐代王冰以义理梳理贯通后文本最终定型,流传至今。

参考文献:

- [1] 张灿理. 黄帝内经文献研究[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5: 32-35.

- Zhang CJ. Literature research of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M].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s, 2005: 32-35.
- [2] 马继兴. 中医文献学基础 [M]. 北京: 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印, 1982.
- Ma JX.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M]. Beijing: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Press, 1982.
- [3] 余嘉锡. 古书通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Yu JX. General rules of ancient literature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197-1469.
- Yang BJ. Notes on Chunqiu Zuozhua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1197-1469.
- [5] 袁咏秋, 曾季光. 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23.
- Yuan YQ, Zeng JG.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dynastie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323.
- [6] 陈国庆. 汉书艺文志注释彙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25-235.
- Chen GQ. Annotation and compilation on Hanshu Yiwenzhi (History of Han Dynasty)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225-235.
- [7] 曹之. 中国古籍编撰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55.
- Cao Z. History of compi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
- [8]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38.
- Yu JX. Elaboration of bibliography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38.
- [9] 曹之. 中国古籍版本学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41.
- Cao Z. Science of versions o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1.
- [10]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17.
- Ma JX. Annotation of medical literature from Mawangdui site [M].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2: 217.
- [11] 毋燕燕. 《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Wu YY. A study on single spread of the Book of Rites [D].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5.
- [12] 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94-99.
- Li L. Proofreading on Guodian Chu bamboo slips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7: 94-99.
- [13] 郜同麟. 试论早期儒家经典的文本歧变——简本《缁衣》与传世本《礼记》再对比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0, 11(2): 96-119.
- Gao TL. Discussion on the divergence of forepart Confucian classics—comparing Li Ji with Zi Yi on Bamboo [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0, 11(2): 96-119.
- [14] 江丹. 王冰编次注释《素问》的原则初探 [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2(3): 16-19.
- Jiang D. Exploration on principle of Wang Bing's compilation of Plain Questions [J].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82(3): 16-19.
- [15] 段逸山. 王冰所见《素问》之“世本”考 [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0, 14(1): 6-9.
- Duan YS. Textual research on “Generation Book” in “Plain Questions” seen by Wang Bing [J]. Acta Universitatis Traditionis Medicis Sinensis Pharmacologiaeque Shanghai, 2000, 14(1): 6-9.
- [16] 山东中医学院, 河北医学院.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3.
-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Hebei University of TCM. Emendation and annotation of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plain questions [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 3.

(收稿日期: 2018-01-15)